

王季思從教七十周年

紀念文集

葉選平題



王季思從教七十周年
紀念文集

葉選平題



(粤) 新登字 1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季思从教七十周年纪念文集/黄天骥主编·一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 12
ISBN7—306—00791—2/I · 64

- I 王季思从教七十周年纪念文集
- II 黄天骥主编
- III ①王季思 ②纪念文集
- IV

责任编辑：陈必胜 封面设计：刘叔伦
责任技编：姚明基 责任校对：张礼风

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南海系列印刷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0.375 印张 51 万字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1000 册 定价：15 元

目 录

共仰皎皎风仪

- 在王季思教授从教 70 周年庆祝大会上
的讲话 杨资元 (1)

桃李满天下 星斗焕文章

- 在王季思教授从教 70 周年庆祝大会上
的讲话 曾汉民 (3)
在庆祝大会上的答辞 王季思 (6)
从学院派批评到新学院派批评
——谈王季思先生的学术追求与学术风范 宁宗一 (9)
王季思先生研究《西厢记》的杰出贡献 黄秉泽 (15)
普及与提高相结合
——评王季思先生主编齐鲁版新评注本
《十大悲剧》《十大喜剧》 董上德 (20)
王季思教授关于诗词革新的理论和实践 赖春泉 (29)
薪尽火传光不绝
——记古代戏曲研究和编注专家王季思 林芷茵 (37)
关于王季思先生二三事 连 珍 (54)
余霞尚满天
——记王季思教授 黄天骥 (56)

- 中国戏曲之宏观发展 黄仕忠 (71)
古典戏曲的团圆观 吕薇芬 (90)

戏曲文物的历史信息价值	黄竹三	(111)
神庙与中国古代剧场	景李虎	(129)
传神史剧论	郭启宏	(146)
孟姜女故事与上古祓禊风俗	康保成	(156)
龙与《柳毅传书》和《张生煮海》	林 建	(178)
关汉卿评传	吴国钦	(186)
南戏改本新论	郑尚宪	(212)
王骥德及其影响下的晚明剧论	谢柏梁	(225)
王骥德与吕天成	徐朔方	(239)
明本潮州戏文《苏六娘》人文背景考察	曾宪通	(250)
我看侯方域形象	师 飖	(269)
论青蛇		
——谈方成培《雷峰塔》札记之二	陈大海	(279)
车王府曲本子弟书评述	刘烈茂	(294)
郭精锐		
骥騤千里 齐足并驰		
——贯云石、蒋昂夫散曲之比较研究	洪柏昭	(303)
再论《中原音韵》的“入派三声”	李新魁	(318)
“诗无达诂”论	孙 立	(341)
中国田园诗之研究	周锡馥	(357)
宋元平话的文化意义	王星琦	(373)
江西诗派略论	陈永正	(390)
谈《水浒传》在我国小说艺术典型化方面 的贡献	沈天佑	(400)
江山之助		
——中国古代文学地域风格论初探	吴承学	(416)
《周易》符号与中国思维	张连顺	(433)

妙解情理 心识文体

——评陆机的文学创作理论	陈必胜	(455)
论李商隐的爱情诗及其朦胧美	罗锡诗	(471)
浅论苏轼岭南诗	苏寰中	(484)
论苏东坡书法美学思想	周伟民	(499)
苏轼贬儋时期的心斋修养和艺术情趣	唐玲玲	(516)
六陵冬青之役考述	欧阳光	(531)
民族大融合中的萨都刺	罗斯宁	(546)
元代文学研究刍议	李修生	(559)
勇拓散文新路的袁宏道	罗东升	(569)
朱彝尊论词的醇雅	邱世友	(584)
王季思著作年表 (1921—1993. 6)	姜海燕 张小莹	(610)
编后记	黄天骥	(645)

共仰皎皎风仪

——在王季思教授从教 70 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原广州市市长、政协主席 杨资元

王季思先生是国内外著名学者，是中国古典词曲研究大家，是中国文史学专家，是才气横溢的诗人，也是诗词革新理论和实践的倡导者。他从教 70 年来，培育造就了大批事业有成的学生，这是王老以他的渊博深厚的学术修养薪传扶掖的结果；是王老脚踏实地，勇于探索，严格治学的学风熏陶影响所致。还使人深深景仰尊敬的是王老冰雪襟怀，笃信光明，坚持正义的高风亮节。在这里我想向诸位介绍一件 40 多年前的故事。1949 年，广州临近解放，国民党反动政府于 7 月 23 日出动荷枪实弹的大队军、警、特务包围中山大学，抓走了一批进步教授和学生，其中有文学院地下学联负责人赖春泉，是中文系学生，经地下党多方组织营救，最后要一名教授出具担保才能出狱，地下党商请王先生，王季思教授大义凛然，慨然应允，无惧于黎明前的深重黑暗，不顾自己的身家性命，到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签名保出了他的学生赖春泉。赖君今天也在座，当年的青年学生，现已白发苍苍了。这一段生死相托的师生情谊故事，正说明了王季思先生的高尚品格，无畏精神，凛然气节。

我也是王季思教授的学生，我是 1946—1949 年在中大文学院中文系读书，当时有许多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教授先后为我们授课，比如王了一（力）先生、钟敬文先生、詹安泰先生、黄海章先生。当时王季思先生教授“元曲”，是我们最喜爱的科目。课余王先生还开讲座，他曾应学生的要求，一个晚上在中大四宿舍

饭堂作了题为《土气息、泥滋味》的讲演，提出文学要植根于人民，反映人民的疾苦和呼声，并要为人民所喜闻乐见。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一句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句话表达了师生之间特有的深厚情谊，也反映了由于信仰各异而流露的巨大遗憾。我们很幸福，老师与真理同在，对着我们的王季思老师，可以大声的说：“吾爱吾师，吾师爱真理，吾更爱吾师。”

这里，我谨献一联：

“绛帐恩深，长怀谆谆教诲；
人间义重，共仰皎皎风仪。”
为吾师寿。

桃李满天下 星斗焕文章

——在王季思教授从教 70 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中山大学校长 曾汉民

王季思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戏曲研究家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家。王老今年 88 岁了，从教 70 年来，王老勤勤恳恳、教书育人、著书立说，在教育和文学研究的园地里辛勤耕耘，无私奉献，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作出了宝贵的贡献，特别是他为我们中山大学创造了名牌——全国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戏曲研究，王老成为戏曲学术界的一代宗师，真可谓“桃李满天下，星斗焕文章”。王季思教授是我们中山大学的骄傲！藉此，我谨代表中山大学，对王季思教授为中山大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1948 年以来，王老一直是我们中山大学的教授。在教学上，王老诲人不倦，在教学方法、教学内容上努力探索，不断创新。他积数十年的经验，明确地提出要注意培养能力和发展智力的教学原则，提出了“学习上记性与悟性，记忆力与理解力，知识的掌握与智力的培养并重”的方法。王老曾针对大学讲坛上的流弊，即学生“上课记笔记、下课背笔记、考试默笔记、过后就忘记”的现象指出，这不是单纯的学习方法问题，而是教学思想原则问题。因此，王老主张教师要把科学的思想方法传授给学生，培养学生举一反三的本领。正因为如此，王老培养了许多高质量的学生，有的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有的成为著名的专家学者，有的是著名的作家等等。

在科学研究方面，王老治学严谨、勤奋刻苦，对中国古代戏

曲，特别是元杂剧有很深的造诣。他的成名作《西厢五剧注》于1944年出版后，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他于1958年发表的关汉卿研究和《西厢记》研究等学术论文，被译成多国文字，影响深远，奠定了他作为古代戏曲研究权威的无可争议的地位。王老认为，要从旧的思想领域跨越过来，就要在世界观方面努力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明确指出研究古典文学的方向和方法，就是要达到古为今用，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的目的。王老努力运用马列主义观点、方法来研究和整理古代文学，他和北大游国恩教授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从60年代至今一直被作为高等院校中文系教材。他主编或编著了《中国戏曲选》、《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桃花扇校注》、《玉轮轩曲论》（三本）、《玉轮轩古典文学论集》等。王老有不少著作和成果获奖，如获第一届全国戏剧理论著作荣誉奖、国家教委颁发的优秀教材奖等等。近几年来，王老不顾年迈体衰，视力微弱，依然笔耕不辍，亲自指导博士研究生，还主编国家社科重点科研项目《全元戏曲》。最近，我们还常在报刊上读到王老的文章。一位年近九旬的老人，工作如此勤奋，思路如此清晰，真是令人佩服，使人感动！

王老不仅是严谨的学者，而且是扶掖后学的良师。他对学生的培养倾尽了心血，对后学的关心、扶掖和策励有口皆碑。他认为“无产阶级的文化建设，不论哪一部门，都需要几代人的长期努力，才可能逐步臻于完善，如果不注意新一代学者的培养，使他们越过自己的足迹，迎头赶上，我们的事业就将徘徊不前，甚至人亡政息，后继乏人。从另一方面看，无产阶级的文化事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必须脚踏实地，从前人积累的基础上，根据新时代的需要，推陈出新地建设起来。”王老从50年代起就与中青年学者合作著书，40年来从未间断，从而带出了一批又一批学术骨干，造就了中山大学戏曲研究的学术梯队，使该专业在全

国保持着领先的地位，这与王老的辛勤劳动是分不开的。王老对后学的扶持指导是无私的、无微不至的，不管是对校内还是校外的学生，他都精心指导，甚至把自己多年积累的资料毫无保留地提供给后学使用，帮助他们著书立说。

王老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人民。他曾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民盟副主委，中山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中文系系主任，古文献研究所所长等职。由于他在学术上的特殊贡献，曾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和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王老70年如一日从事教育事业，受到广大师生的热爱和尊重。今天，我们庆祝他从教70周年，就是要表彰和学习他热爱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学习他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献身教育和文学事业的无私奉献精神；学习他严谨治学的学风和热情培养、奖掖后学的高尚情操。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活动，更好地发扬王季思教授等老一辈学者献身祖国教育事业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高尚品德，为树立良好的校风和学风而努力！

在庆祝大会上的答辞

王季思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同事、各位同学：

我因为年纪大了，乡音越来越重，气也不是很足，所以由天骥代我致答辞。

我感谢诸位的光临，感谢广州市政协和学校领导的盛意。在这个隆重的大会上，我是有许多的感触的。但是，我只想说三句话。

第一，我选择教师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这条路，走对了。这是第一句话。

教师的工作对象，主要是青年学生，我为培养学生，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也从学生身上不断吸取了精神营养，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我从来认为，“教学相长”。我教人，人也教我。所以，教师的职业，是神圣的职业。教学，也是我人生最大的乐趣。

如果拿一个合格的教师来要求自己，那么，我的缺点还真不少。现在退休，书也不能教了，也谈不上对学生有什么奉献。不过，举行这次庆祝活动，也是很有意义的，正如古代燕昭王所做的“千金买骏骨”。这活动既显示了我国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又在当前人才市场的竞争中，提供范例，招致海内外有真才实学的千里马，到教育战线上来。所以，我理解为什么要召开这个大会。同志们朋友们对我的赞扬，实际上是对教师这个神圣职业的赞扬。它说明，当一个人民教师，是光荣的，为年青一代付出自己的劳动，是值得的。悠悠70年，我走教师这条道路，走对了。

第二，我选择广东作为我大半生教学的园地，这条路，走对了。

我从教 70 年，有 45 年的时间在中山大学度过。回想 1931 年，我在安徽宣城中学，写过两句诗：“东坡先生醉不死，白头更作岭南人。”我喜欢喝酒，现在白了头，作了岭南人，应了 62 年前说过的话。这当然是巧合，而且自比东坡，也不免狂妄自大。但是，我当时写这两句诗，也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有它的历史背景和个人的思想根源的。

广东，在近代史上一直是革命运动的策源地，是中外物资交流、文化交流的南大门，一直为国内有志革新的仁人志士所向往。我个人从小爱读梁启超的文章，爱读黄遵宪的诗歌，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受孙中山先生革命学说的影响就更大。45 年来，我越来越爱上广东的风土人情，也越来越适应中山大学的自然环境和工作条件。我常说，我是幸运的，因为在广东、在学校，我遇上了许多好的领导，许多好的同事，许多好的学生。所以，我来广东，来中山大学，这条路，走对了。

第三，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力图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以指导对中国文学史和戏曲史的研究，得出自己的结论。现在看来，这条路，也走对了。

当然，在这条道路上摸索前进的时候，我也经历过一些坑坑坎坎，也走过一些弯路，写过一些错误文章，既批错了自己，也伤害过别人。我学习马克思主义，有收益，而学得不好，付出了代价。今天算一笔总帐，我想基本上还是可以收支平衡的吧！总之，我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使自己的教学和科研，进入了新的境界。所以，这条路，也走对了。

同志们，70 年来，我在教学和科研中，做了一些工作。但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更多的工作，要靠中年一代，青年一代，继续干下去，而且会比我干得更好。我曾经给我的学生写过一首诗：

“人生有限而无限，历史无情而有情；薪尽火传光不绝，长留双眼看春星。”

我相信，我们的事业，一定后继有人，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一定得到弘扬，我们的国家，一定更加繁荣昌盛。

最后我还要多说一句，我爱祖国，我爱学生，我为当一个人民教师而感到自豪。

谢谢大家！

从学院派批评到新学院派批评

——谈王季思先生的学术追求与学术风范

宁宗一

“学院派”和“学院派批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名声并不佳。似乎一提到“学院派”就包含着贬意；而一提到“学院派批评”似乎就是僵化、教条和学究气的同义语。即使一些著名的批评专家也未能免俗。比如法国文学理论家阿尔贝·蒂博代（1874—1936年）在他的批评学代表作《六说文学批评》中曾做了如下的分类：一种是由一般读者和报刊记者完成的“自发的批评”（即“趣味批评”）；一种是专家教授从事的“职业的批评”（即“理性批评”）；另外第三种就是文学大家所表述的“大师的批评”（即“直觉批评”），他们是源于创作实践的“寻美”，带有一定的模糊性。蒂博代在对以大学教授和学者为主的“职业的批评”，甚多嘲讽之词，他公然认为，“职业的批评”多老生常谈，死守规则，思想懒惰，缺乏敏锐的艺术感觉，迟疑症，沉闷的学究气，没有洞察力等等。当然，蒂博代也不得不承认专家教授的批评，因为本人都具有良好的教养、深厚的历史感、知识体系化、视野开阔、持论平正通达等长处。其实，在这里，蒂博代恰恰没有看到“职业的批评”也即学者教授的批评最擅长的，正是文学史研究。或者说，文学史研究基本上是一种“职业的批评”。报刊记者或一般文学爱好者以及文学大师虽偶尔涉足此一领域，但主要研究成果无疑多出于大学教授学者之手。事实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批评家，如鲁迅、闻一多、朱自清、俞平伯、孙楷第、王瑶、何其芳、钱钟书等等莫不是专家教授的所谓“学院派”批评

家。这说明，文学批评以及古典文学研究的生命内核，它的创造性价值，它的理论化，科学精神和追求新知的品格，主要是通过职业的、理性批评体现与实现的。为此，高举“学院派批评”旗帜者或跻身“学院派”中的学人，无需沮丧，甚或感到抬不起头来。

季思先生正是在这一点上是我们的典范。王先生在他的学术论著自选集的“自序”中说得再明晰不过了。他老人家一生与教书生涯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总结自己的教学与科研上走过的道路的四点心得体会中，无不说明季思先生虽然以感悟为认知的基础，但在根本上仍然是以深层理性的创见，标明了他对传统文化（特别是诗、词、曲）所作的阐释与判断，贡献最大。诸如他对诗艺、词学和曲论虽多做具体评述，然而其中关于艺术与美学的形而上之思，却一直处在我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前沿。

这里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季思先生在知识和理论素养上，可以称之为广博、深湛，是学者、哲人。因此他的古典文学研究都能将鉴赏得来的感性提升到理性的高度，呈现批评的形而上色彩。所谓学者化，正是上述两方面的统一。因此，任何把学者化理解成从理论到理论的枯燥推理，理解为从高楼到深宅地吊书袋，都是一种误解。也可以说，批评家的哲学是带着生活原汁的，有生命的哲学。事实上，季思先生正是如此，在他的自选集“自序”第一点中就说：“热爱人生，面向现实，是我做人的基本态度，也是我做学问的态度。”所谓“人生有忧患”“往往能激发人的志气，锻炼人的才能，成就也更大”。从这一意义上讲，季思先生的批评之树才是如此常青。

第二，季思先生具有批评态度的诚实、认真和严谨，有批评的道德感和责任心，这就保证了他对文本阐释的客观公正。季思先生说：“学术天下公器，真理愈辩愈明。在辩论中，要求出于公

心，既虚心接受别人正确的意见，勇于改正自己的失误；对前人错误的成说，同代人有影响的误解，也敢于提出驳正。”纵观季思先生的代表论著都是实践了他的这一高尚的学术风范。比如他就《牡丹亭》的生活底蕴对侯外庐先生的所谓“曲意”之驳难；关于《西厢记》作者的探讨，都证明了一点：健康的批评态度，正是健康的人格的体现。季思先生的学术研究从来没有吞吞吐吐、语焉不详，没有左顾右盼，更没有担心批评会引来反批评。这又进一步说明：文学史、戏曲史研究不只需要才气与艺术感觉，更需要丰富的学识与公正的评判，而后者正是学院派之所长。

再者，中国知识分子的兴奋点往往在政治上。然而相对地说，真正的学院派不介入直接的政治斗争，相对超脱的地位使其比较容易保持学术独立和思维自由。虽说在中国很难完全做到“为学术而学术”，但少一点借学术以言政治或发牢骚，为某一政治主张、文学集团辩护，还是能给读者相对公正的引导。

第三，季思先生还是驾驭语言的能手。他的批评文体在叙述上的科学和优雅是学术界公认的。这不仅表现在他重视对优秀批评文体传统的继承，还在于他对它以前的文体有创新的精神。这是因为批评文体背后，隐含的文本继承越多，则文本的语义厚度越强。季思先生自述：“为读者着想，尤其是为青年读者着想，在写作上力求举一反三，深入浅出。……”这可能就是我们常说的“厚积薄发”。季思先生继承了鲁迅等大师的深刻、简约，又具有流畅、富丽等特色，这是我们这些后来者所崇拜的大家风范。

从大的文化视野来看，季思先生作为“学院派批评”的一位代表人物，他已完成了三项任务，即：

一、建立了自己的古典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理论体系。季思先生对文化断裂的切实填补，打通文化墙壁和贯通古今中外的开拓，无疑是为中国文学史及其理论批评建设的重要贡献。

二、建立了自己的批评风度。批评风度在本质上是文化精神